

张涅——著

中國文化的基質

先秦诸子的世界

论语

孙子兵法

墨子

老子

孟子

庄子

商君书

公孙龙子

管子

韩非子

荀子

吕氏春秋

淮南子

走近诸子，走进诸子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文化的基质: 先秦诸子的世界 / 张涅著. —
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20.10
(近思录)
ISBN 978-7-308-20504-7

I. ①中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先秦哲学—研究 IV.
①B220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20) 第159761号

中国文化的基质——先秦诸子的世界

张 涅 著

责任编辑 宋旭华
文字编辑 吴 超
责任校对 吴 庆
封面设计 项梦怡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(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: 310007)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
印 刷 绍兴市越生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 7.125
字 数 166千
版 印 次 2020年10月第1版 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308-20504-7
定 价 4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联系方式: (0571) 88925591; <http://zjdxcbstmall.com>

前言：阅读诸子的方法问题

这本小书介绍诸子著作的思想内容，以及入门的路径。

诸子时代从春秋末到西汉初，三百余年。一般称为“先秦诸子”，只是就其重点而言，是约定俗成的说法。

诸子的著作定本约在西汉中期已经形成。流传至今的，有《论语》《孙子兵法》《墨子》《老子》《孟子》《庄子》《商君书》《公孙龙子》《管子》《韩非子》《荀子》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十三种。另外，《孙臆兵法》在1972年才出土发现，对汉以后的思想文化的产生影响不大，《列子》《文子》等疑为魏晋时期的著述，这里就不列入了。

大家知道，这些都属于“轴心时代”的思想创造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质。卡尔·雅斯贝尔斯说过，公元前500年前后，“在中国，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，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，包括墨子、庄子、列子和诸子百家，都出现了。……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”^a。无疑，要懂得中国的历史文

^a 卡尔·雅斯贝尔斯：《历史的起源与目标》，魏楚雄、俞新天译，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8-9页。

化，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，需要读诸子的著作。

没有读过诸子著作，没有对诸子思想有所领悟，却说懂中国文化，这是不可信的。

—

读诸子的著作，首先该注意两点：

（一）以书为单位。为什么需要这样？因为在现有文献条件下，不清楚作者是哪一位，或哪一些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诸子著作中，书名有某一个“子”，却不能认定就是那一个“子”的著作。前人的研究已证明，一部分以他开端而已，另一部分则只是假托。因此从客观出发，我们只能说阅读这部著作，分析这部著作的思想内容，从这部著作中获得了认识；而不能说阅读某位“子”的著作，认识某位“子”的思想。严格地表达，应该是“《老子》说”“《庄子》说”，而不是“老子说”“庄子说”。后者只是一种习惯的、简单的说法。这个观点是傅斯年先生特别强调的，他曾说过：“研究秦前问题，只能以书为单位，不能以人为单位。……因为‘文献不足征也’。”^a这显然是很理性的认识。

注意这一点，是强调诸子著作内容的复杂性。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人的思想内容；用一个系统结构去归纳，不但过于简单，而且不够客观。

（二）不能套用现代的阅读分析方法。大家知道，现代的阅读分析方法是从西学那里过来的。西学以概念为基本单位，然后在概念的基础上做判断，在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推理，构成一个体

^a 傅斯年：《评〈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〉》，顾颉刚主编《古史辨》第二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141页。

系。其中的概念都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，在任何语言环境下都是不变的。因此，所表达的意义是一般的、普遍的，对于所有阅读者都一样。假如套用这样的认识，以为只要领域相关，诸子所表达的也对于所有人有意义，那么就会出问题了。举个例子，《论语》说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。”（《里仁》）那么我们年轻时最好不要离开家乡找工作了，因为这是孔子的告诫。再例如，《孙子兵法》说：“少则能逃之，不若则能避之。”（《谋攻篇》）那么打不过敌人就逃命吧，因为这是兵圣的指示。诸子著作中，普遍这类表达。显然，这样的阅读分析肯定是错误的。

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在习惯了现代的阅读和分析方法，没有注意到诸子文本表达的特殊性。

二

那么，诸子文本的表达有怎样的特殊性呢？主要的有两个：

（1）特定性；（2）流变性。

所谓特定性，指不是对所有对象说的，不是对所有读者都有意义。在战国早中期，大多是对于特定对象的表达。到战国中期以后，有了针对普遍对象的表达，也还有许多特定性的。因此，没有现代著作那样的一般性意义。

那特定性可分为两类。一类是个别性的。例如《论语》，是原始的语录体，大多对个别性的对象而言。各条语录的原本意义，由语录句义、语录涉及的对象和语录产生的语境结合起来才形成的。我们在阅读时，该落实到语录所及的具体对象或事件中。要知道，语录原本只对于特定场境中的对象构成意义。例如孔子斥责冉有“非吾徒也”（《先进》），只是对他佐助季氏田赋这一事件的批评，并非一般性的结论。否则，就不能解释他

何以又被列在“十哲”（《先进》）中。《论语》中多位弟子问“仁”，孔子的回答各不相同，当然也不是对某个弟子负责任，对另外弟子应付从事。李贽说“有为而发，不过因病发药，随时处方”（《焚书·童心说》），就指出了这一点。

另外是对某一类的对象说的，是类别性的。例如《孙子兵法》，前四篇对统帅讲战略原则，中间八篇对将军讲战术要求，末篇《用间》对统帅和将军都有意义。所以《形篇》讲“无奇胜”^a，《势篇》讲“以奇胜”，并没有矛盾。因为《形篇》是对统帅讲的，统帅需要考虑政治、外交、经济等因素，“奇”即使“胜”，也没有决定性的意义；而《势篇》对将军而言，将军着重考虑具体作战的问题，要求出奇制胜。这样“不敌则避之”（《计篇》）之类的指示也能合理地解释，因为其只是对统帅讲的战争继续与否的原则。假若对于将军而言，怎么可能指示其在寡不敌众时临阵脱逃呢？显然，对统帅说的，对将军没有指导意义。

那些现在看来很抽象的表达，原本也往往是针对某一类对象的指示。例如《老子》，在各章的背后也潜藏着特定类别的对象，大略有“士”“侯王”“圣人”三类。分清了对对象类别的特定性，才可以读懂各章的本旨。例如对“士”讲的修养原则和方法，对“侯王”“圣人”没有意义，其并非一般的人生论。对“侯王”讲的政治谋略和手段，对“士”“圣人”也无甚意义。每一章的言说都以“道”为根本，但是因为对象类别的不同，对象所及的现实问题的不同，“道”的意义也不同意。对象的特定性，导致了“道”意义的不确定性和丰富性。

^a 据银雀山简本。通行本无。

大概到了战国中后期，开始对普遍对象而言。秦汉之间的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，有贯通全书的构架考虑，更有一般性表达的企图。但是，其中许多篇章还是对特定对象说的。

对某个人当时的需要说的，或是对某一类别的人的需要说的，其所指示的意义，自然不能作为一般性来理解。

三

所谓流变性，指思想观点是变化发展的，不是静态的、结构性的存在。

大家知道，在战国早中期，诸子著作基本上由章句组成；到后期才有篇的形式，秦汉间才有整部著作的构架考虑。秦之前的那些章句或篇，可能是创始人不同时期的思想表达，也可能是门人、后学的思想记录。所以，形成的一部著作，实际上是一个学派的论集。一部著作经过了近百年、甚至二百多年的时间才形成定本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学派的形成经过了近百年、甚至二百多年的历史过程。在那样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，后学有思想发展是必然的。把它们编辑在一起，自然会呈现思想的流变性。

在这种流变中，前一章句或篇的观点往往被之后的思想所批判和超越。其只是一个阶段的总结，是思想的驿站。从这个角度讲，关于诸子，我们与其说他们表达了什么思想，不如说他们在思想着什么，思想到了什么。其中的思想是一个动词，不是名词。

这里，可能还留下学派创始人思想流变的痕迹。例如《逍遥游》篇，可能是庄周的思想表达。他先抒写人生的宏大志向，像鲲鹏展翅一样，以为“用大”就是“逍遥”；接着由“小大之辩”思考到“物任其性”，认识到适合本性的才是“逍遥”，

否定了“用大”说；随后又认识到“性”的存在不可能有真正的“逍遥”，就又否定“物任其性”说，提出“无己”“无功”“无名”的观点。这第三个阶段的思想也不是最后的结论，只是因为篇幅的关系止于此。这方面的思想在另外篇中还在继续，例如《德充符》说到“人而无情，何以为人”，就对“无己”“无功”“无名”作了否定。因为开始思考人何以“逍遥”的问题时，人是有“情”有“性”的；若为“无”了，就不是对有“情”有“性”的人而言，也就没有意义了。

更普遍可见的是学派思想的流变性。例如《论语》，子夏说：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”（《颜渊》）宰我说：“三年之丧，期已久矣。”（《阳货》）显然是战国初墨家“兼爱”“节葬”思想的先导。再有佐助季氏，作赋税改革，被孔子斥为“非吾徒也”（《先进》），是因为与法家的政治实践相近。这些弟子的言行是孔门学派思想流变的表现，也是诸子思潮在春秋后期的初步。

再如《孙子兵法》，讲到“归师勿遏，围师遗阙，穷寇勿追”（《军争篇》），与《司马法》“逐奔不过百步，纵绥不过三舍”意思相同，属于春秋贵族战争时期“争义不争利”（《仁本》）原则的留存。另外讲“兵者，诡道也”（《计篇》）、“十则围之”（《谋攻篇》）、“千里杀将”（《九地篇》）等，则是春秋末以后的战略战术。在这里约略可见春秋至战国军事思想和战术原则的变化。

到了战国中后期，各家在坚持己说的同时吸收其他家观点，往往杂糅中呈现流变，流变中呈现多元。例如《庄子》的“外杂篇”对于“内篇”的思想发展：《天地》“尧观乎华”片断转到了神仙道教思想；《山木》“庄子行于山中”寓言提出“处乎材

与不材之间”的观点，进一步阐释“无用”的处世思想；《至乐》“庄子妻死”寓言表达了超越死亡的态度，较之《德充符》的“形”“神”关系又有发展；《天地》“子贡南游于楚”寓言追求精神意义，由对形体的超越拓展到对技术的超越。

再如《管子》，《经言》组提出以“商”辅“农”、以“法”补“礼”的政治经济思想，当为管子本人或学派早期思想的记录或传述。《外言》以下七组，从法家、兵家、名家、农家、阴阳家、轻重家、黄老道家等方向阐发转进，或继续政治路线的探索，或旁入经济学、军事学、农学等领域，或把“水”“气”“心”“道”提升至形而上的层面。显然，学派思想有流变性和多向性。

到了秦汉杂家那里，才有了整部著作的构架性考虑。但是各篇章的内容还只是大略分类，大多还是拼凑起来的。细细分析，也有流变和多元的痕迹。例如《吕氏春秋》中，“十二纪”以“阴阳”思想为指导，自成体系，很可能早出。“八览”“六论”为杂家性质，很可能晚出。

可见，忽略了诸子思想的流变性特征，系统认识和建构不可能是客观的。

四

注意到这些文本形式上的特征，就知道许多诸子思想原本是对特定对象说的，原本意义是特定性的。所谓的观点，只是思想流程中的阶段性表达。

那么，我们读诸子著作，如何得益呢？一般的，是从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同一类别的经验，以指导生活和工作。就是依据“类”和“宜”这两点。“类”指我们的经验需要与诸子的特定

性表达是同一类的。“宜”是适宜，诸子的指示恰可给予我们经验活动的指导。

例如《论语》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（《里仁》），原本应该是对于父母需要其照顾的某个弟子说的。假如我们的父母也需要照顾，那么就遵循这条语录的旨意。假如父母健康，兄妹很多，那么这条语录对于我们不发生意义。再如《孙子兵法》“少则能逃之，不若则能避之”（《谋攻篇》），作为统帅，读之有意义；作为将军，读之没有用，因为面临再强大的敌人都得拼死作战。

当然，要深刻地领会诸子思想，还应该从特定性的表达中挖掘背后的一般性，从流变性的过程中建构内在的系统性。并且，由这样的一般性和系统性，去统摄所有的特定性意义和阶段性意义。

再以《论语》为例。我们要寻觅其背后的一般性意义，那么这个一般性意义是什么呢？这当然会有不同的理解。比如“敬”与“和”，都有合理性。“敬”是每一个人的做事原则，是修养的本质要求。“和”是和睦、和谐，是个人之间、个人与社会以及自然的相处准则，也是国家社会的目标所在。从《论语》本旨和当代社会需要上看，似强调“和”更有价值。因为《论语》思想建立在“礼”的基础上，“礼”蕴含着等差和谐的精神，用一个词来概括，就是“和”。《论语》中那些请教、应答以及教诲、批判的语录，背后都有一个社会的“和”的本旨。为什么斥责冉有“非吾徒也”？是因为其佐助季氏“聚敛”（《先进》），目的只在于“利”，背离了“和”的政治理想。特别重视“仁”和“中庸”，也是因为能促进“和”。同理，弟子们有关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（《颜渊》）的说法，以及税制、礼制

方面的改革，也是从社会发展形势出发对于“和”的再认识。把握了“和”这个一般性意义，就可以统贯“道”的本体论、“礼”的伦理政治论、“仁”的人生论、“学”的教育论等，形成思想系统。

再如《孙子兵法》，分析那些特定性、流变性表达背后的本旨，会发现都是一个“利”，是为了政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。战略上考虑政治、外交、经济条件，是为了避免战败，确保“利”的实现。战术上讲“虚实”“奇正”“军争”，重视地形和间谍工作，也是为了谋求最大可能的“利”。即使“穷寇勿迫”，也是从春秋战争中追歼“穷寇”往往不能得“利”，还损失“义”这一角度考虑的。故而建构《孙子兵法》的思想体系，应该以“利”为核心，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展开。

当然，有关的认识会是多元的。这里所强调的，是这个工作不能从若干章句的语义中归纳出来，而应该深入其特定性、流变性的背后加以判定。例如关于《论语》的“和”，不能从《学而》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一语得出。关于《孙子兵法》的“利”，也不能只依据《计篇》“因利而制权”、《作战篇》“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，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”这类句义。

由这样的方法和范式，更能进入诸子的世界。与传统的读法相比，这是另一条路径。

目 录

《论语》	1
《孙子兵法》	19
《墨子》	32
《老子》	48
《孟子》	64
《庄子》	80
《商君书》	96
《公孙龙子》	110
《管子》	126
《韩非子》	145
《荀子》	161
《吕氏春秋》	178
《淮南子》	195
后 记	210

《论语》

孔子（前551—前479），名丘，字仲尼，鲁国陬邑（今山东曲阜）人。他一生致力于培养君子，对于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有深远的思考。他是伟大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先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。

孔子的生平大略可分为五段：（1）约30岁前。他从小就爱好周礼，逐渐学有所成。他的父亲叔梁纥属于武士阶层，但是在他出生时，家境已经衰落。后来办学名闻遐迩，颜路、曾点、子路、伯牛、冉有、颜渊等追随他学习。（2）约30—50岁，既求学又求仕。约33岁时，他去周朝都城洛阳向老子学习礼，34岁时去齐国会见齐景公。回到鲁国后，整理《诗》的音乐，所教弟子众多。（3）51—54岁，在鲁国参政。他先出任中都宰，再历任司空、大司寇、摄相等职。曾经陪鲁定公参加与齐国的夹谷之会，收回被齐国侵占的郛、灌、龟阴三处边邑。随后“堕三都”，但是堕毁了费邑与郕邑，最后毁成邑失败，不得不离开鲁国。（4）55—68岁，周游列国。他带领弟子们寻求能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，颠沛流离，表现了坚定的信仰。（5）69岁时回到鲁国。他

继续从事教学，系统整理了《诗》《书》等典籍，特别重视《春秋》。73岁逝世，葬于鲁国城北泗水之上。

《论语》记录的是孔子及其弟子等人的思想言行。从《论语》的内容构成来看，大约形成于春秋末至战国初。《论语》的编纂者当为孔门弟子的弟子，具体哪几位，说法不一。最早言及“论语”一词意义的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认为“《论语》者，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，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‘论语’”。

“辑而论纂”是编辑整理的意思。但是后人有不同的认识，影响大的观点有两种：一种认为指讨论的语录，另一种认为是有条理论述的话。

一

要进入《论语》的世界，首先该注意它的形式问题。《论语》的思想，是通过语录体形式来表达的。

语录体以章句为单位，语录之间可能有意义关联，但是表达上不讲究逻辑关系。分为两类：（1）一般的语录体。语录是经过概括提炼的，语录意义就在句义中，句义构成全部的语录意义。而且对所有人都有意义，是普遍性的。例如扬雄的《法言》。

（2）原始的语录体。基本上是按照原始状态记录的，原本只对于语录涉及的对象有意义。就是我们在理解其原本意义时，需要把语录句义与语录涉及的对象、语录产生的场境结合起来。语录意义由语录的内容与形式共同构成，不能只看句义内容。

《论语》的绝大多数语录是原始形成并记录保存下来的，属于原始的语录体。在《论语》中，出现的人物不是典型创造，也不是寓言寄托，而是那个时代实际存在过的。那些话语，大多是

在某一个具体场境中说的，说的人与说的对象一起构成经验活动。在它的背后，是具体的事件。例如孔子斥责宰予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朽也”，是针对那一次“昼寝”（《公冶长》）的事件。斥责冉有“非吾徒也”，是因为其佐助季氏搞税制改革，“聚敛而附益之”（《先进》）。

根据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的语录分章来统计：《论语》五百一十二章语录，有事迹的四十五章，有特定对象或一定语境的二百〇四章，没有记录语境或特定对象的二百六十三章。后者的大多数，应该是记录者、编纂者省略或忽略了。其原本也应该针对某人或某事而言，当时在场者都知道，不妨省略。他们没想到，这样对于后人理解原本意义造成了困难。

另外，还得注意著作形成过程中的问题。可以肯定的是，《论语》的编纂经过了多人之手。《论语》中多处出现“曾子”“有子”，既尊称“子”，表明曾子和有子的弟子参与过。

“曾子”和“有子”都是孔子的学生，说明《论语》中除了孔子的思想，还有孔子弟子们的认识。而且《论语》的编纂工作很可能是前后补续，不曾协作整理过。从全书看，二十篇没有专题考虑，缺乏有机安排。语录还出现重复的情况，如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”，在《泰伯》篇和《宪问》篇都有。这表明编纂时相当程度上保留了语录的原始状态。

原始语录体和多人参与编纂，是《论语》著作的形式特征。据此可以走进《论语》的大门。

二

由此进入，可以看到《论语》的思想原本有两个特征：（1）特定性；（2）流变性。

特定性是指语录原本是对特定对象说的，对特定对象产生意义；我们不能以为每个人读了都会有教益，不能作普遍性来理解。要理解这些语录的原本意义，应该落实到语录所及的具体对象和事件中。

例如对于宰予、冉有的斥责，肯定只是在某一场合针对某一问题而发，并非一般性的概述或结论，否则我们不能理解他俩何以又被列入“十哲”（《先进》）中。“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昼夜”（《子罕》），原本也只是孔子某一时刻在河边“叹人年往去”（皇侃《论语义疏》），并非一生都如此悲观。

有一些语录的句义，在现在看来是真理性的，也不能忽略其原本是特定性的。例如《为政》：“子曰：‘由！诲女知之乎！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’”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，是为学、为人的基本态度，肯定有普遍意义。但是，其原来是说“由！诲女知之乎”，是针对子路的性格问题，为了他个人发展的需要。如朱熹说的，“子路好勇，盖有强其所不知以为知者，故夫子告之曰：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”（《论语集注》）。

李贽说《论语》“有为而发，不过因病发药，随时处方”（《焚书·童心说》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学人的诸多歧义，其实是没有注意到语录意义的特定性造成的。例如《学而》“无友不如己者”，其应该是对某一场合的某一事件或某对象而言，原本有具体的针对性。后人误以为是普遍性、绝对性的告诫，就难以自圆其说；因为教育本身需要与“不如己者”相友好。一些学者在训诂上下功夫，例如陈天祥把“如”字注为“似”（《四书辨疑》），黄式三把“如”释为“类”（《论语后案》），也不能周全。凡是与自己不相似的，或不是同类的，都不宜做朋友：这怎么说也道理不足。

那么，这些特定意义的语录，一般的阅读者怎样来学习接受呢？那要看阅读者当时的经验需要是什么，是否与那条语录的特定意义同一类的。若是同一类的，就是可接受的，有收益的。若不是同一类的，那条语录的特定意义就只是一种知识，记在心里，以后有类似经历时才接受。例如《里仁》“父母在，不远游。游必有方”，应该是对于父母生活需要照顾的人说的，否则那么多弟子跟着他学习，甚至周游列国，就不好解释了。如此，阅读者若父母需要照顾，这条语录就给他指导意义。若父母身体健康，兄弟姐妹多，那么记得这条语录而已，不能去践行。再如《为政》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到退休年龄的人会有深切的感受。若是年轻人，“三十而立”（《为政》）才与他们的经验相关，更有意义。

读那些意义特定性的著作，都应注意“类”和“宜”的问题。那意义与经验需要是同一“类”的，才是“宜”的，有用的。不注意“类”，以为都是普遍性的、绝对性的，那是错误。若运用到人生和政治实践中，会造成灾难。

现代以来，很多学人把特定性的意义作普遍性理解，而且据此建立思想体系。这样的语录阐释，提出的某个理论观点，当然可能有时代意义，但是脱离了文本也是显然的。

三

第二点流变性，指《论语》思想不是静态的，孔门弟子对于孔子思想有宣传阐述，也有歧出。孔门是一个学派，有思想的流变。所谓的矛盾，很可能是学派思想的发展。

孔门学派以“内圣外王”为目标，就是在修养方面追求圣人境界，在政治方面追求实现王道。后来的孟子和荀子，分别着重